



抗日战士

曾元三和82师的战友们

曾达敏 著

非外借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抗日战士

曾元三和82师的战友们

曾达敏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日战士曾元三和82师的战友们 / 曾达敏著. -- 贵阳 :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412-1872-9

I. ①抗… II. ①曾… III. ①曾元三 (1908—1986) —生平事迹②政治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08338号

抗日战士曾元三和82师的战友们

作 者	曾达敏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贵州出版集团大楼
邮 编	550081
印 刷	贵阳德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3.25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12-1872-9
定 价	20.00元

目 录

82师的前世今生.....	1
武汉会战与鄂南游击战.....	14
第一次长沙会战，鄂南冬季攻势作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	31
太子庙事件与杨柳井事件.....	40
血战松山.....	59
江河入海流.....	86

82师的前世今生

要讲述82师的前世今生，得先说说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松桃县）的人文地理、历史民风。松桃县位于贵州省的东北角，湘黔川三省交界处。地质结构上，松桃处于武陵山脉凹陷褶皱之中，从西向东依次排列着梵净山穹窿背斜褶皱、总岭向斜褶皱、八石坡背斜褶皱。沿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由西向东缓缓过渡到湘西丘陵的斜坡地带，呈东西侧略高、中间低的盆地地形。由于强烈的武陵运动和燕山构造运动，使境内东、西部地形地貌形成了鲜明对照。西部岩层倾角大，切角深，有许多海拔800米以上的险峻高山；东部由于地质构造力较弱，海拔一般在600米以下，相对切角较小，地势起伏不大，为丘陵状中低山地貌。再向东去，便是与松桃同处江南古陆边缘的湘西丘陵山地。全县山脉水系多由西北至东南走向延伸，那些发源于梵净山、腊尔山等崇山峻岭中的条条溪水，绕过山间的村落田坝，跳过断崖，纷纷相邀着涌入境内的松桃河、河界营河、普觉河、甘龙河，然后汇入沅水，一去不回头地奔向东方。20世纪从贵阳至松桃县城有两条老路可走，走古道过凉亭坳，或走稍新一些的公路

注：本书中82师指国民革命军第82师。

则行经黄莲坡，不论走哪一条，当你立于凉亭坳或是黄莲坡，向山脚的县城方向遥望，那些拗口的地质学词汇都会得到形象生动的诠释，造物主那双巨手捏出来的褶皱，深割出来的沟壑，强烈地震撼着人的灵魂。相比这些远古的武陵运动、燕山运动，人类的改朝换代、各种变革是如此渺小，不值一提，甚至这块土地上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也变得微不足道。在松桃居住的人除了汉族之外，主要为苗族等少数民族。松桃苗族先民起源于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的远古部落氏族，是发展至江淮一带的“三苗”后裔。明清以来，对这块土地上的苗族同胞，统治者均实行着怀柔与征伐双管齐下的策略。明代来此征讨驻屯的汉族官兵，他们的家眷及后代也就留在了这块土地上，再加上陆续从江南、中原，特别是从江西迁移过来，做生意和垦荒的汉族，便组成了这块土地上的居民。除正大、盘信、普觉等乡镇苗族相对集中外，更多的地方是汉苗杂居。虽说是不同的民族，可老百姓一向和睦相处，走亲串友，不同民族间通婚也非罕见之事。我的老家松桃县盘信乡柳瓦寨虽是一个汉族村子，但四周全是苗族村寨，父亲自小拜一位邻寨的苗族老人为继牙（也就是干爹），逢年过节都要前往拜望，老人也将其视为自己的小孩，呵护有加，父亲因此能说得一口苗话。一位会看面相的朋友曾经问我是否为苗族，我反问他为何这样问，他说我的骨相里带着苗族的血统，他这说法也许不无根据。据父亲讲述，从我们第一位从江西丰城流落到柳瓦寨的老祖宗算起，我们家族在此已有近200年了，当年在这样一个方圆上百里（1里等于0.5千米，下同）都为苗族的偏隅，我

的那一位母系先祖将苗族的血缘带进了我们这个家族，也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经过近百年的征伐与被征伐，这里民风剽悍。相传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年代，曾国藩组织湘军与太平军对抗，湘军中最为强悍的部队被称为赶军。所谓赶军，即曾国藩在湘西、黔东一带招募的军队，这些勤劳朴实、尚武倔强的山民、苗胞、土家族人，被招入军队之后，集中从当时的镇赶（今湖南凤凰）上船，沿沅水而下，进入洞庭湖，有人问他们从哪里来，回答从镇赶来，于是被人称为赶子兵。这些赶子兵操着黔东湘西的苗语、土家语或是方言，难以与其他地方的人交流，甚至连“投降”两个汉字也不会讲，加上身上流淌着祖先剽悍倔强的血液，打起仗来只知向前猛冲，决不后退。听父亲讲过，松桃兵冲锋之时，并不喊“冲”而是高呼苗语“暴”，我试着呼叫过，确实是“暴”更为威武雄壮，振奋人心。父亲曾向我解释过他打仗为什么总是向前冲的缘故，“战场上你就得向前冲，向前冲，那子弹迎着你，只有一次打着你的机会。你要是怕死向后跑，子弹追着你打不算，碰着石头还要打你一回，那你就得死两回了。”原来他对于战场上生死的概率是这样计算的，不知真是这样，还是他在为他们这帮松桃兵在战场上总是死战不退所找的理由？这无法考证。有言道：

“无湘不成军，无赶不成湘。”这些赶子兵形成了湘军之中一股可畏的力量。在松桃，从军尚武之风盛行，“人死卯朝天，不死又过年”这句民谣就被当年从军在外的松桃青年常挂在嘴边，这句看似蔑视生命的话语背后，却隐含了对于当时动乱匪患与贫穷

的极度憎恶。

说到82师，离不了松桃的民俗民风，更是离不开罗启疆，也离不开82师的前身——罗启疆所创建的独立34旅。

罗启疆是82师的第一任师长，松桃县一位民国时期的传奇军人。但凡20世纪50年代前出生的松桃人，总能津津乐道地说出几件与罗启疆有关的事情。然而在我的父母口中，对他的评述却截然不同。父亲说起罗启疆，满是欣赏与敬佩，父亲从士兵到军官的军队生涯，大部分是在82师度过的，算是罗启疆的战将之一。我母亲姓涂，娘家在松桃也算是个大家族，祖上在清同治年间曾做过南京知府，只是到母亲这一辈已家道中落。提到罗启疆，母亲十分不屑甚至是怨恨，因为我那曾在罗启疆的师部任文书的舅舅涂宗奎是被罗启疆枪毙的。

罗启疆（1902—1940），字封荣，后改效之，贵州松桃县达车乡张坝堰人，17岁就在家乡变卖田产招募壮丁组建武装，进入川军罗靛光部。据有关资料记载，罗启疆为苗族，实际上张坝堰罗姓并非苗族，可是罗启疆母系血统确为苗族，因此罗启疆也讲得一口流利的苗语，他的部队之中有许多苗族的士兵与军官，为了与自己的下属融合沟通，别人说他是苗族，他也承认。罗启疆进入第10军后，任第10军直属独立团团团长。随第10军参加北伐，在湖北临城立下赫赫战功。后第10军军长王天培被杀，罗启疆的独立团被改编为30师的第3团，罗启疆为副师长，代行师长之职，仍兼任第3团团团长。罗启疆当时年仅24岁，因而在罗的家乡松桃城内，老少妇孺均传诵着“罗启疆24岁当师长”的歌谣，罗

启疆也成为当时松桃年轻人崇拜和效仿的榜样。1929年罗启疆投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麾下，被委任为独立第2师师长。此时我的父亲和既是同乡、同学，又是同一天出门当兵的好友文安庆刚离开了43军（黔军第1师，加入北伐军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3军），准备前往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可是到了武汉却没了盘缠，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流落在武汉街头正在寻求出路之际，恰好罗启疆的独立第2师驻扎于汉口桥口，于是一起前往投奔，父亲被罗启疆派为该师1团8连中尉排长，这便是父亲与文安庆第一次进入罗启疆的部队。

不久罗启疆的独立第2师又被改编为51师135旅，归属唐生智指挥。罗启疆因在投奔李、白之时，曾遵李、白之命，处理过蒋系的贺对廷部，因此得罪过蒋介石、唐生智，自知难以在其下生存，决定另谋发展，即向唐生智请求准许带一个连作护卫回家省亲。当时罗的意图是自己先带走一部分人员、枪械，回乡扩建队伍，然后要副旅长罗铨把整个部队拖到鄂西同他联系，另作他图。罗启疆带一个加强连回松桃后，在松桃及周边地区招募兵员，组建了三个团。可是副旅长罗铨未能带出全部队伍，我的父亲与文安庆均滞留在了唐生智部。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罗启疆部。

罗启疆派罗铨到武汉找国民政府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接洽。何成浚将罗启疆部改为暂编第19旅，委任罗启疆为旅长，罗铨为副旅长。1930年秋何成浚将暂编19旅改为独立34旅。至此，在抗战中屡立战功的独立34旅正式成立，其官兵大多为罗启疆在松桃

地区招募的黔籍子弟。

罗启疆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段变幻莫测、荆棘丛生的险恶环境之下能够生存发展，不仅因为他的机警果断、勇鸷无畏，也与他为人豪爽、胸怀宽广有关。在罗启疆回松桃募兵准备成立队伍之时，他做了件在松桃及周边地区影响极大的事情。当时听说罗启疆要回松桃，与罗家有宿仇的长兴姚家十分惊慌害怕（在罗启疆外出从军的初期，姚因与罗启疆的父亲争民团团总的职位，将罗启疆的父亲捕杀，并将罗父的首级砍下），料想罗启疆必定会来报仇，于是聚集全寨人，准备拼死抵抗。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罗启疆并未去找姚算账，而是托人给姚带去书信，不仅表示要放弃报仇，并且希望自己的堂弟罗启明能与姚的女儿结为秦晋之好。此举轰动了整个黔东、湘西、川东地区，结果引得松桃、（四川）秀山、（湖南）花垣一带的乡民纷纷前往罗启疆的招兵处报名从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罗启疆在镇远电请率部赴华北抗日，军委会回电令其待命。八一三事变发生，日寇进犯上海，罗旅奉调南京，蒋介石召见罗启疆并令其率部开赴太仓，据守浏河一线，隶属罗卓英部参加淞沪会战，先后在福山镇、无锡、浏河、大场等地与日军作战，重创日军。南京失守后，罗部又奉命转战安徽南浔一带，攻打宁国的日军扁担山阵地。罗启疆亲临前线指挥，反复冲锋，终将日寇击溃。罗旅从在上海作战起，转战南京、南浔，到强攻扁担山，连续作战，伤亡惨重。战后，罗启疆收拾残部，经清点，独立34旅出征前6000余人，历时3个

多月的残酷战斗，阵亡近3000人，负伤及失散失踪1000多人，尚存2000余人。松桃子弟在淞沪会战中做出了巨大牺牲。罗部而后转到宁国整编为一个团，编入第4军90师，独立34旅至此完成了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使命。罗启疆将残余的部队交出之后，马上又请命回乡组建部队。罗启疆自从军以来，几起几落，特别是在淞沪会战之中，他倾注心血所组建的部队损失惨重，可是他无一丝后退之念，稍稍喘口气，便又开始重建部队，可见罗启疆百折不挠之性格。因为独立34旅在淞沪会战中的出色表现，军事委员会奖励大洋两万元。而且在福山镇、无锡的两个战役打得相当出色，也让中国陆军界对于这支从黔东湘西的山野中走出来的部队刮目相看。淞沪会战中与独立34旅一起并肩作战的中央嫡系部队陆军第1师及第58师都对独立34旅表示了敬佩，第1师师长李铁军、第58师师长俞济时均向最高统帅部和蒋介石报告说，独立34旅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罗启疆部能打、会打，只要补充些兵员，换些新的装备，又将是一支强有力的部队。最高统帅部与蒋介石接受了李、俞二人的建议，批准了罗启疆的请求，让其回松桃组建部队。罗启疆选了一部分老部下，由副旅长欧百川率领，经南昌到湖南转回贵州松桃，罗启疆本人则到武汉进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嘉奖了他，并委任罗为预备第13师师长，欧百川为副师长，王德安为参谋长。

1938年春，罗启疆在松桃、秀山、花垣一带，以预备第13师的名义招募军士官兵，各地失散的原独立34旅和其他部队的黔、湘、川籍官兵，以及编入第4军张鹏霄团的部分官兵闻讯后，陆

续归来。罗启疆以带来的人为骨干，依靠川湘黔边区地方人士的支持，仅3个月就组成约有8000人的三个团和师直属连队。经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派员点验后发给装备。

罗启疆在抗战前夕和抗战之中，两次回家乡松桃组建部队，松桃及周边的黔、湘、川地区的汉、苗、侗、土家族各族人民，为国家送上了数万名优秀子弟，他们大多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不久罗部即开赴江西，在新余奉命与原82师整编为一个师，撤销预备第13师番号，恢复第82师的番号，罗启疆任师长，欧百川任副师长，王德安任参谋长，辖两旅四个团：第244旅，旅长杨恩贵；第246旅，旅长曾鲁；第487团，团长朱均富；第488团，团长毛定松；第491团，团长张国勋；第492团，团长张炳茂。另有师直属连队若干，全师官兵总数为12 000人。82师的高级军官中，罗启疆、欧百川、杨恩贵、毛定松均为松桃人，其中特别传奇的是欧百川，他与我的父亲是同乡，他的老家松桃柳浦村是一个苗族村寨，与我们老家柳瓦寨隔山相望，仅十余里地之遥。欧百川是一个苗族汉子，曾为贺龙元帅的副师长，与贺龙一起参与了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投奔了罗启疆的独立34旅，罗启疆不仅收留了他，还任他为副旅长，当时，这样的“要犯”罗启疆也敢收留，居然也还获得了南京政府的认可。

我的父亲与文安庆在1929年与罗启疆部分开后，也曾进出过好几支不同的部队，几经漂泊，他们最后在谢彬（贵州铜仁人）

任师长的85师留了下来。1933年夏，父亲在谢彬部510团3营9连任连长，被送到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学习，经过一年的学习，次年6月毕业。该期学员被送往南京举行毕业典礼，由中央军校校务委员张学良代蒋介石授予毕业证，父亲的毕业成绩是该期学员中的第一名。师长谢彬知道了此事后，高兴地说：“曾元三这下给85师长脸了。”旁边的参谋人员说：“他回来是不是该提拔提拔啊？”“那是自然。”7月父亲回到85师，不几天便被提升为501团2营营长。1935年8月，85师在湖北板栗园与红军贺龙部激战，师长谢彬被打死，事后师参谋长刘竹铭（贵州松桃人）从武汉行营主任何应成处得到师长任命，85师大部分师部军官、营长、连长及两个团长均为刘竹铭的铜仁、松桃同乡，自然拥戴刘竹铭。可是副师长陈铨秋请来83师副师长陈铁，并得到蒋介石给予陈铁任85师师长的任命书。二者皆是中央政府的任命，刘陈之争，以刘的失败告终。事后，追随刘竹铭的一名团长，两名营长和刘竹铭一起被枪毙，师部的几名主要军官仓皇出走，其中有之后担任140师师长的毛定松，之后任102师代师长的熊欣垣。几乎全部营长及一部分连长被判刑入狱，里面就有我的父亲曾元三和同为营长的文安庆等人。在被关押两年多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们一同申请参加抗日。获准释放后，父亲与文安庆再次来到武汉。这时已是1938年初，当时南京已经失守，3月的武汉成了全国的抗战中心，全国的抗日力量在这里聚集，中共的第18集团军也在这里设有办事处，办事处正在办一个关于游击战的讲习班，同时也在招募军事人员。父亲与文安庆前往讲习班听了

几次课，认为教员们的讲授深入浅出，很有道理，特别是叶剑英将军的讲授令他们非常信服，二人便动了报名前往第18集团军的念头。这时我的祖母托人带信给父亲，要他无论如何回趟松桃老家，并且坚决不允许他远离家乡到北方去，如果他执意要走，她就会从松桃老家赶来阻止。父亲知道，自他被关进监狱以来，祖母对自己牵肠挂肚，两年多前和自己一样在外当兵的三弟曾元顺也在一次战斗中去世，如果加入第18集团军，此去必定是到西北一带作战，祖母这两年不知为他们两兄弟流了多少眼泪，性格倔强的祖母一定会说到做到，从老家赶来。于是他只好放弃到第18集团军的念头。此时罗启疆知道了父亲与文安庆的处境，便带信给二人，送来路费，并任命他们为营长，二人自然是十分乐意，这便是他们第二次进入罗启疆部。他们加入该师之后便受命到松桃、秀山一带组建部队。父亲算是遂了祖母的心愿，可是等他回到家乡松桃，祖母却已因病去世，这令他伤心不已。父亲是个孝子，常对我们说起他年幼时因饥饿向祖母讨饭吃，祖母无法填饱他的肚皮，只能躲在一旁悄悄流泪的情景，多年以后他说到祖母，仍有些哽咽。那时他的弟弟曾元惠尚还年少，祖父又不太理事，要安葬祖母，只能靠他这个长兄，可是他那时刚从狱中放出来，身上并无几文钱，于是便从部队悄悄带了几条枪回到松桃，准备换些钱安葬我的祖母。虽说当时军队的官佐私底下都有着这样的做法，可卖枪毕竟是违法的事情，得找个可靠的买主，父亲就将枪偷偷卖给当时松桃有钱有势的士绅黄辑伍先生，黄辑伍当即收下了枪，并未立即给钱，而是告诉父亲说，第二天再给他送

钱去。黄辑伍也曾在独立34旅服役过，又是松桃有名的士绅，父亲当然是相信他的。第二天，黄辑伍派人送来一百块大洋，并将父亲前一天卖给他的枪支一并送回，自己则前来上门吊唁我的祖母。我知道松桃地方上对于黄辑伍先生多有说辞，可他当时的做法足以让人铭记一生，父亲当时也就一个小营长，马上得返回抗战前线，未来是死是活不得而知，黄先生若是为自己考虑，犯不着做这样的投资。其实当时在整个民族同仇敌忾、共同抗日的情结之下，不论哪一个阶层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做贡献。罗启疆两次回家乡组建部队，若不是地方士绅的大力支持，他也不可能这么快就组成了近万人的部队。

在我父亲和文安庆来到82师之前，板栗园事变后从85师仓皇出走的毛定松已先于他们二人进入罗启疆部，任488团团长，父亲就在毛团任2营营长。毛定松是松桃孟溪人，父亲与他从军的经历极为相似。1925年，父亲刚好16岁，正逢在黔军第1师服役的松桃人赵璧回家乡招兵，父亲与同班同学文安庆相邀报名进入该师学兵队。我的祖母曾追至兵营，要将父亲拖回家，父亲死活不干，祖母只好往父亲的口袋里塞上家中仅有的两块大洋，含泪看着父亲跟部队走了。回头看着远远立在山坳上为自己送行的祖母的身影，父亲与文安庆相互激励说：“背时无非是死，不死总要出头。”当然此话决计是不可让祖母知晓的。毛定松的母亲在他17岁时也不许他前去从军，将他关在家中，搬了条凳子守在他的卧室门口，他是将衣服塞在被子里头，骗过家人，翻窗去了军营。与父亲不同的是，父亲是一名标准的职业军人，而毛定松

除了具有出色的军事才能外，还极有才气，写得一手好诗，是一名儒将。毛定松在85师时就是父亲所敬重的老上司，二人相互信任，现在同为罗启疆的部下，更是亲密无间。毛定松、文安庆和我的父亲曾元三均为82师中后期的重要军官，除他们三人外，当时还有许多在淞沪会战之中被打散的松桃籍军人、有志的松桃籍青年学子，听到罗启疆招兵的消息，都怀着抗日救国之心，纷纷前来投奔罗启疆，聚集于82师旗下，就如发源于梵净山、腊尔山这些崇山峻岭中的那些涓涓溪水，绕过山岭，越过险滩，汇入沅水，一齐奔向那大江大海。

这些人中有后来去了延安的刘鸿儒（我的远房表叔）、我的表哥梁中武（梁礼周）、我的表叔刘鸿涛、刘鸿斌及姚祖荫、秀山雅江的王履成、湘西茶峒的侯祖松、刘定一以及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青年学生。这些怀着一腔热血报效国家的青年学子，给82师注入了新鲜血液。其中的刘鸿儒、梁中武、杨代淦、田庆丰更有一番特殊的经历，这几位青年学生曾通过松桃人唐必恭与《新华日报》主笔范长江的同学关系，由范长江介绍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相邀前往延安，得到董必武主任的欣然答允，答应他们可乘坐便车前往延安，只是第二天梁中武、杨代淦、田庆丰等人遇日机轰炸，因躲避日机而耽误了行程。而刘鸿儒居住在办事处附近，得以搭上便车去了延安，进入了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任八路军某团政委，1947年牺牲于锦州战场。我的表哥梁中武之后进入了中央军校，再以后进入了82师。表哥当时在武汉商专读书，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只差一年就能毕业，倘若不去从

军，毕业后自然可以找份称心安稳的工作，他的父亲早年病逝，而我的姑姑就他一个小孩，悉心地培养他，原本是指望他能为自己养老送终。我的父亲与文安庆出狱之后原本打算前往投奔中共领导下的第18集团军，这是父亲亲口对我所述，我的表哥梁中武原本是要与刘鸿儒一起去延安的，这在《松桃文史资料》第三辑中也有记载。这里说这些事情，并非是在遗憾惋惜他们错过机遇，那样的惋惜已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想表明当时青年学子踊跃从军，职业军人舍命参战，实在未曾刻意去选择参加哪一支军队，一心只想为国家效命，想去抗击在中国土地上肆虐的日本人。